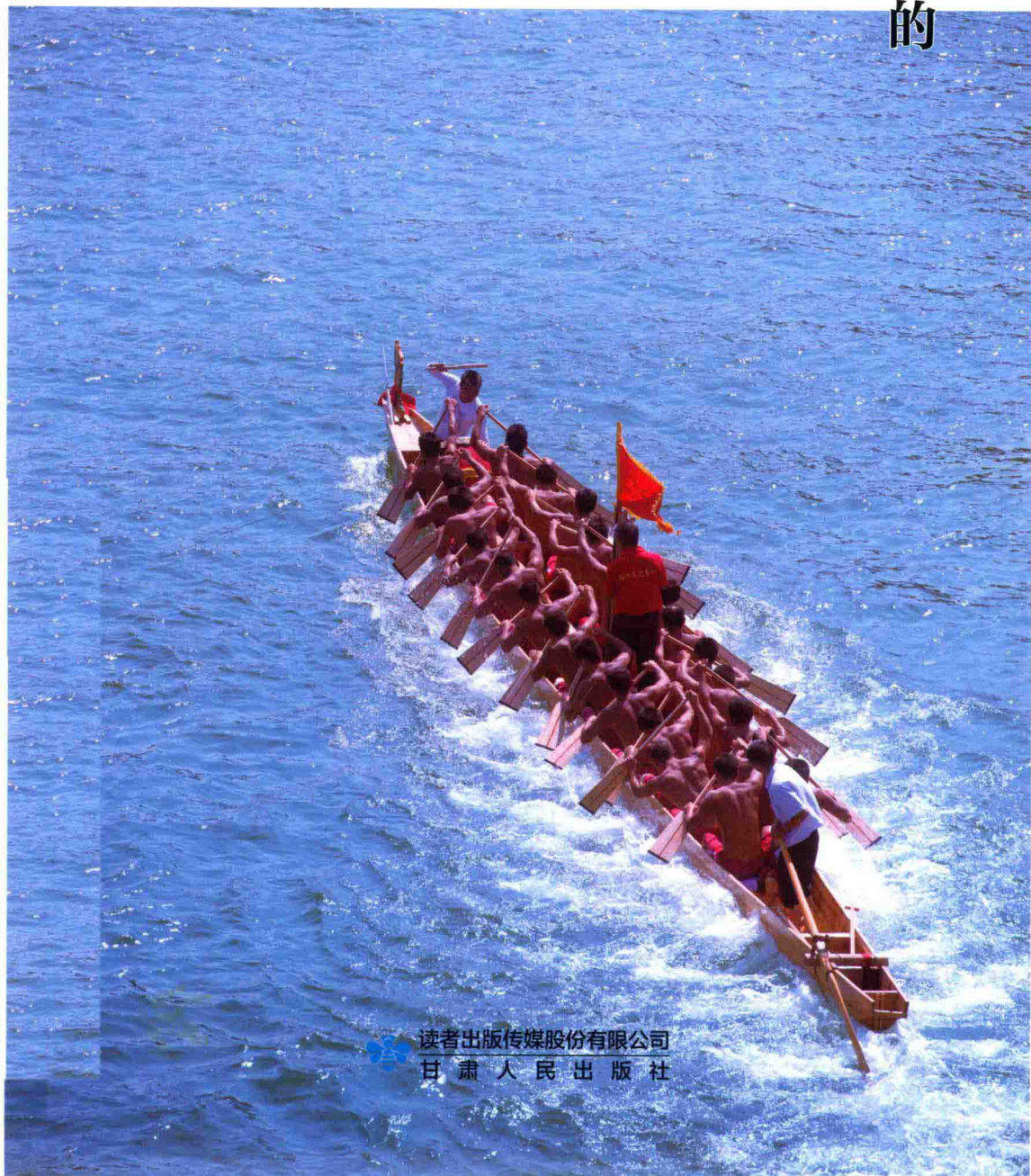


读者
丛书
DUZHE CONGSHU

读者丛书编辑组/编

大时代下的 生活叙事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人民出版社

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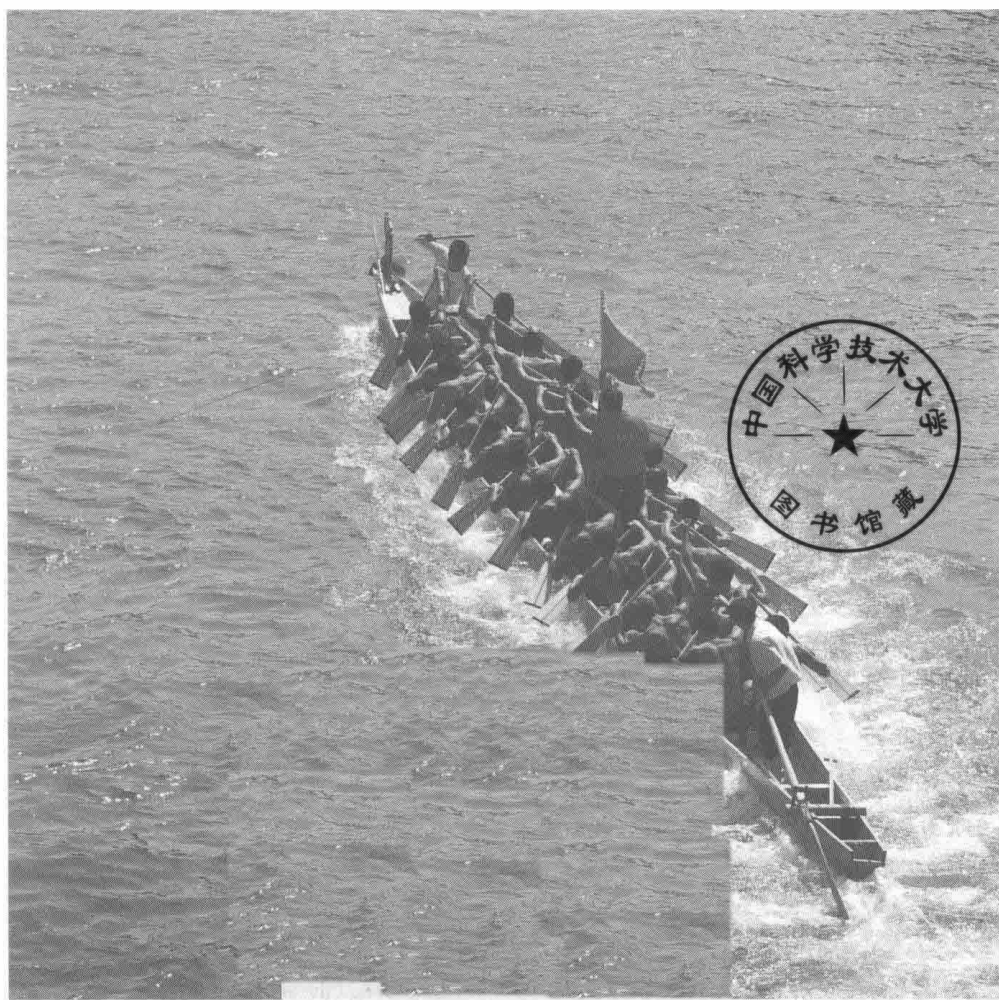
丛书

DUZHE CONGSHU

国家记忆读本

大时代下的生活叙事

读者丛书编辑组 / 编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大时代下的生活叙事 / 读者丛书编辑组编. --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2019.3

（读者丛书·国家记忆读本）

ISBN 978-7-226-05427-7

I. ①大… II. ①读…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39136号

总策划：马永强 李树军

项目统筹：李树军 党晨飞

策划编辑：党晨飞

责任编辑：马 强

封面设计：久品轩

大时代下的生活叙事

读者丛书编辑组 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15.25 插页 2 字数 226 千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 000

ISBN 978-7-226-05427-7

定价：32.80元

目 录

CONTENTS

- 001 《阳光灿烂的日子》追忆 / 王 朔
- 005 我们在 17 岁时干些什么 / 舒 婷
- 008 日常中国：从 50 年代到 90 年代 / 钱理群等
- 017 消逝的“放学路上” / 王开岭
- 022 我的野球史 / 毕飞宇
- 025 香港电影的似水流年 / 赵款款
- 030 1991 年的少女，今年依然 24 岁 / 林一芙
- 035 一个豪华的精神年代 / 张立宪
- 039 那些与青春有关的记忆 / 佚 名
- 043 学生时代的三个梦 / 曾 涛
- 049 80、90 年代中期的童年：质朴游戏 / 佚 名
- 051 我是北大穷学生 / 马 超
- 056 感谢土气的 90 年代，感谢土气的
兰州大学 / 十年砍柴
- 061 心在哪里安放 / 孟宪利
- 066 如果你也生于 1995 年 / Soul 麦芽
- 070 你们沉迷世界杯，我们却只想
回到 90 年代 / 沈云娅
- 076 历史的见证 / 杨肇林

- 081 澳门回归记 / 佚名
- 086 筑起的，不仅仅是一座大坝…… / 王慧敏
- 091 堵决口的将军和士兵 / 汪守德
- 095 中国“863 计划”诞生记 / 马晓丽
- 102 从“美国梦”到“世界梦”
——留美 30 年 / 陈思进
- 108 外滩，生生不息 / 陈丹燕
- 115 中国私营企业 20 年 / 寿蓓蓓
- 122 世纪情书的变换 / 二 波 周晓冰
- 127 单位结婚证明：结婚不必再让领导签字 / 李桂杰
- 130 相亲 20 年 / 佚名
- 134 10 元钱能做什么 / 周 陆
- 140 飞跃球鞋与梅花运动衣 / 贾 维
- 143 90 年代：出门打车就打“黄面的” / 佚名
- 146 被遗忘的城市符号：公用电话亭 / 加 菲
- 149 电报：消逝的电波 / 李桂杰
- 153 闲聊 90 年代的那些广告片 / 卡斯卡斯
- 160 新中国半个世纪春节点击回放 / 佚名
- 166 童年的欢乐记忆：国宝大熊猫盼盼去世 / 佚名
- 170 股市风云 / 高鹤君
- 176 90 年代的奖券热潮：多少次相信下一个
幸运的就是我 / Gugu 咕咕咕
- 182 无厘头的理由 / 乙 乙
- 184 进口大片：轰炸眼球 / 李桂杰

188	那套家庭卡拉 OK / 囡之女神 dsisy
193	肯德基：洋快餐在中国的风行 / 李桂杰
200	呼啦圈风暴 / 杨 叶
206	MP3 中的智慧 / 因 此
208	我为什么回国 / 张朝阳
216	我的 1999 / 吴晓波
220	1990 这一代 / 杨 迪
225	得承认我们有点儿羡慕自己讨厌的人 / 王 路
229	书写，让我与故乡达成和解 / 阿 来
232	那些互联网的弄潮儿 / 吴晓波
238	致谢

《阳光灿烂的日子》追忆

王 朔

1991年我搬到那儿才知道姜文也住在那儿，马路对面。

1992年《动物凶猛》发表，我送了一本《收获》给姜文看。当时他正在争夺《红粉》，我在他家见到苏童。有两个导演说，不知道《动物凶猛》怎么拍成电影。有一个导演说，姜文拍不了这个东西。

我记不太清在这之前还是在这之后，在刘晓庆家里见到文隽。姜文说这是个不错的香港人。他们正在合作拍《龙腾中国》，文隽是制片人。

在我家或他家经常谈起《动物凶猛》这小说，姜文东问西问的，打听这小说的背景、原型，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处理某些事件。我拒绝做编剧，我刚刚写完大量小说和电视剧本，写作能力陷于瘫痪。尤其痛恨给有追求的导演做编剧，惨痛经历不堪回首。我无法帮助姜文把小说变为一个电影的思路，那些东西只能产生于他的头脑。

到今天我都认为电影导演应该自己写剧本，你要拍什么、怎么拍，自己

先搞清楚，犯不着照死了折磨编剧，在编剧的尸体上来提高自己。

接着他去美国拍《北京人在纽约》，次年回来要拍张艺谋的《我是你爸爸》。

在美国他打回几个电话，流露出要放弃拍《我是你爸爸》的意思。

1993年他从美国回来，开始写剧本，名字改为《阳光灿烂的日子》，非常印象的感觉。我去重庆饭店看他，已经有了剧组人员，制片主任、剧务什么的。房间里贴满了毛主席、红卫兵们的照片。有一面墙贴的都是美丽少女和酷似姜文的半大小子的照片。

文隽从港台两地筹集了一些钱，内地一家公司也出了一笔钱，三等分，凑成不大不小的投资规模。

剧本写了几个月，拿出来时比小说还长，大概七万多字。我学习了一下，知道电影剧本怎么写了。哎哟，可叹我混了这么些年，确实有些时候是欺世盗名。

开了个座谈会，谈了些什么意见忘记了。

夏雨已经定了。还集中了一些浑小子。让他们穿上军装，住进部队营房，与世隔绝，每天看西哈努克访问全国，听毛主席语录、诗词歌。苏雷给他们讲了传统。

副导演们每天都去各中学、各部队大院找演员，普遍反映找不到印象中的男孩子和女孩子，包括已经进组的孩子，就觉得不知哪儿有点不对。我印象中那时候我们都很漂亮、纯洁、健康。一个朋友还保存着一些那时候的照片，黑白的，135相机拍的，很小的那种。看了照片才发现印象错误，那个时候，我们都不漂亮，又黑又瘦，眼神暗淡、偏执，如果算不上愚昧的话。我以为我们纯洁，其实何曾纯洁？所以找不着印象中的我们。现在城市中的孩子已没有那种眼神，不复存在那种劲头。那是农村少年的形象。尽管如此，我还是认定印象中的女孩子是真实的。其他人也这么认为。似乎现在的街头还能时而看到那样的清纯少女的身影一闪即过，所谓惊鸿一瞥。可是找

来的一群，细细一看，又都不是。似乎那少女只在朦胧间是清晰的，努力去看，化脓化水化为俗物。可见此物难寻、珍稀，也许只是我们心灵的一个投影。

开机那天，放了很多鞭炮，硝烟弥漫。那以后北京便禁放烟花爆竹。女演员仍未定，拜四方的时候三个姐儿都上去一字排开。有这等胸襟，我是自愧不如。

最后定了宁静。

之后他们拍戏，我混日子。冯小刚拍“老师”那场戏时，我去101中学看热闹。一遍又一遍，姜文、顾长卫拍得认真，我在一旁看得无聊。

因为无聊，我开始戒烟，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抽还是不抽？因为虚荣，我答应在戏中扮演一个角色。去卢沟桥拍第一场戏时我就开始后悔，大冬天北风呼啸拍夏天的戏，冻得我又流鼻涕又蹿稀，斯文扫地。

演“流氓”的是武警指挥学校的军官们。自行车是附近工厂工人人们的，工会主席趁工人们在上班，让剧组用大卡车偷偷拉走的。

拍完戏我坐在姜文和制片主任二勇的车上在河滩旷野上疾驶，远远只见一个汉子扬着手跑过来追车，可怜地扒着车窗往里看，跟着车跑。他就是工会主席。拍戏用的几百辆自行车被砸坏不少，有的甚至被大卸八块，他没法向下班的工人们交代。第二场戏是在“莫斯科餐厅”。我有一句台词。开拍前我紧张得烟瘾大发，一个月的戒烟成果毁于一旦。喝了一整瓶干白葡萄酒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差不多被那群武警军官扔了整整一夜，不断地抛上天空，又掉下来。最后所有人都筋疲力尽了，有一次我掉下来，百十号人居然没有一个人伸手接一下。幸亏在落地前有个善人伸出一只脚，我掉在他脚上才幸免于难。在空中我无数次地问，问自己：你这是何苦呢？有意思吗？难道就不能安于当个观众看电影吗？

第二天清晨从“老莫”出来，我知道我的明星梦破灭了。

又过了很长时间，听说剧组资金出了问题，文隽找不着了。戏还在拍。二勇到处赊账，一些他们拍过戏的景点，再有摄制组去一律不接待。再后来听说姜文拿出自己的钱应付摄制组开支。

年底，在北京饭店的一个饭局上见到姜文，他没精打采的样子。大家都问戏什么时候拍完。一个演员开玩笑说听说片子改名叫《大约在冬季》，姜文差点急了。

又一次见到姜文，他说前两天刚喝醉了一次，现在还难受呢。

1994年，片子停机了。文隽没来结账。那几天二勇最盼望、最想见的人就是文隽，他把剩下的钱都用来给文隽打电报了。

片子后期做到一半一分钱也没了。

姜文到处找新投资人，我跟着见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大款。

这时，让·路易和王薇来北京筹拍《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让·路易看了双片，以法国人的作风给姜文写了洋洋七张纸的观后感，盛赞。他以取得该片德国版权为条件，安排姜文去德国做后期。

9月，片子去了威尼斯。一天夜里，我的呼机响了，上面打出一行字，于是我知道片子得了最佳男演员奖。

1995年片子在上海首映，鲜花、五星酒店、新闻发布会。我以演员的身份参加了上述活动。

接着是北京、天津。

《阳光灿烂的日子》取得了1995年国产影片最好的票房纪录。

这一切最后以“阳光灿烂”影视公司成立而告结束。

（摘自《王朔文集：随笔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版）

我们在 17 岁时干什么

舒 婷

17 岁的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每天在镜子前，龇牙咧嘴地挤压青春痘。

儿子现在的班级成立文学社，众同仁在冥思苦想给班刊命名时，盯着社长“硕果累累”的苞谷脸，豁然贯通，遂一致同意叫《青春痘》。社长即儿子，一任而已，其伟大使命莫非就是贡献脸上那张“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样板？

他老爸 17 岁时，引为己任的是作家的使命感，社长交椅一坐好几年，几至坐穿。文学自是圣殿一般，班刊非“采贝”即“鼓浪”，满纸豪言壮语。脸上火力更足，未有洗痘水、敷痘霜之类济世良方，常常这瘤那瘤叠罗汉，冒冒尖尖，岌岌可危。至今太阳穴两旁还赫然留有遗迹，雨天可以存好几盅水呢。

我 17 岁时下了乡，清水净风滋润，缺鱼少肉没有油脂浪费在脸上。偶

尔鼻尖眉头爆出一两颗信号弹，便忧心如焚，有男知青来串门，就将刘海儿拉来拨去设法遮丑。就着油灯读名著，唱两首外国民歌，抄古今中外格言，写华丽动情的信。技痒时谄几行诗，随着手抄本四处乱飞，没有刊名，捞不到社长当，时时提心吊胆。

17岁时，儿子既不叠被，又不整理书桌，更不洗衣服和臭袜子，喊泡茶来、饭盛好，鞋要自选，衣要名牌，每月上一次发廊，整天问有什么好吃的，唯一自己动手的只有开冰箱和打电脑游戏。不过，长途旅行时他是家中的全劳力，因为老爸老妈的颈椎、腰椎、肩周关节遭岁月风化，儿子便手提肩扛，嘴里交着自己的机票和身份证。同学中有拿“月薪”“周薪”的，儿子领“日薪”，从未超支，略有节余。压岁钱、奖金（小提琴或作文比赛所得）或生日红包统统自觉上缴，尚无经济头脑，不懂回扣。

他老爸17岁的上半年紧锣密鼓地打拼，准备上中文系。屁股和膝盖处的补丁厚如烙饼，而且颜色迥异。海外频频寄来的进口布料、纯毛衣服，窝脏般压在箱底发霉生蛀。他升任学生会副主席、团委书记、对敌斗争积极分子兼足球队长，该足球队转战全省没有失过一个球，遂去大连参加全国少年足球比赛度过17岁生日。下半年碰上“文化大革命”，忙着写大字报、贴标语，早请示、晚汇报，被抄家、去串联。绘画学了3个月，小提琴练了半年，饭不会做、衣不会洗，直到两年后去插队。

我17岁时体重只有42公斤，要挑50公斤的谷担，摸田、育秧、割稻，学一样哭一场。自留地里栽菜秧子，不长叶子只生虫，幸亏种番薯倒是光长叶子，便采来炒着吃。跟着《新华字典》每天学5个生字，翻英汉读物，背唐诗宋词，做大学梦。腋下夹一本禁书，到各知青点去投桃报李，换来各种意外的惊喜。衣裳、头发每日一洗，抽屉、衣箱纹丝不乱，学会用二两肉、一板豆腐、几棵芥菜做一桌佳肴。和伙伴过中秋节，然后佯醉，为了不必到结霜的小河边刷碗。

17岁的儿子崇拜贝克汉姆、谢霆锋和麦当劳兄弟。小时候口必称郑渊

洁，从未仰视过老爸老妈，称班主任“凡姐”，直呼物理老师“阿弟”，说班上男生都叫女朋友“老婆”。我趁机追问儿子：“有没有拍拖？”答：“我还没有那么畅销。”上网聊天，打又臭又长的电话，时而卷着舌头说两句英语。从幼儿园开始，到音乐小学再到音乐中学，在小提琴专业浸泡10年，一打开私房音响，还是张信哲和王菲。功课百忙之中，不忘见缝插针频频跟电视机“接吻”，因为他近视已达750度，却不肯戴眼镜。

他老爸17岁时开始写小说，至今没发表；再写诗，发表以后除了他老妈将《诗刊》放在菜篮里向左邻右舍显摆外，似无追星女青年；改写寓言、随笔、科幻小说，书出得薄薄的，反响也是小小的。喜欢马雅可夫斯基、雷锋、贝多芬、郭小川，其中没有我。有心栽花无心插柳，而今所出版的书大多是数十万字一本的诗歌理论，这是后话。

17岁时，我梦想的是一斤膨体纱毛线，可以打一件时髦的套衫；满满一柜大部头小说，最后是卷了边、发了黄、略有破损的书才好看；梦想不用向队长赔笑脸，不必上大队部去送礼，也无须走县城“四个面向办公室”找关系，忽然一纸通知书便腾云驾雾进了大学。猛听一声吆喝：“翻谷喽！”被震醒过来，原来自己还在晒场边打盹儿。

从未想过成为一名作家或诗人，更不懂得梦想当母亲。

咳！17岁！

（摘自《读者·校园版》2012年第22期）

日常中国：从 50 年代到 90 年代

钱理群 陈思和 陈平原 苏 童 陈 村 赵长天 韩少功

50 年代

五 爱

当时到处在进行“五爱”教育（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学校也开展了大规模的活动，每一次有一个中心主题，把课内教学与课外活动有机统一起来。例如，在“爱祖国周”，语文课选读有关文学作品，历史课讲祖国历史，地理课介绍祖国地理，课外活动举行歌颂祖国的诗歌朗诵会、演讲会等等。这些活动都强调学生自我教育，我们这些学生会、少儿队筹委会的“头儿”都直接参加了组织和领导工作。我们学校是南京市最早成立少儿队组织的，在我当选第一任大队长后，还到许多学校去介绍经验。

有了自己的组织，学校的活动就更加频繁，也更有生气了。印象最深的是所谓“小先生”活动：将住在学校周围的失学儿童组织起来（这种因家庭困难不能读书的儿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不少的），在课余时间给他们上课。我被推为“小先生学校”的首任校长，还煞有介事地正式聘任了班主任、任课教员。开始大家都没有经验，有一位姓徐的四年级女同学，担任“小先生学校”一年级语文教员，她上第一堂课，打开书就哇啦哇啦念课文，也不管学生是否接受，不到下课时间就把一册教科书教完了，不知下面该怎么讲，就丢下学生，跑来向我这位“校长”“请示”。我也没有办法，只好再和她一起去请教老师，也就是我们学生的“太老师”。后来“学校”大概就逐渐走上了正轨。有一位卖冰棍的学生，毕业后还专门画了一幅画送给我，上面写着“敬爱的钱老师留念”几个字。这幅画我一直珍藏着，“文化大革命”中散失了，真有些可惜。

（钱群理）

60 年代

困难时期

说起“三年自然灾害”，大约是因为小，也是因为住在那儿的人家一般都很穷，对于那段苦日子我并没有什么太深的印象。只记得每当母亲发薪的日子家里可以买一些配给的白面，全家动手，又是发酵面，又是做馒头，像过节一样。外祖父用一根筷子和一块废铁自制了一杆小秤，坐在旁边一个一个地称馒头，每个二两重，秤杆稍稍往上翘，他也要伸手去摘下一块面团来，以示公正。我怎么也不明白一家人做馒头吃为何要如此一丝不苟，不过外祖父那种忠于职守的神情，至今也没忘记。

那时我家的家境似乎越来越差。父亲在西安有时寄些钱来，有时就不寄。母亲每月都在愁着家里的开销，当时我的舅舅一个在果园里工作，一个

还在念书，对家里贴补有限，母亲成了主要的经济支柱。外祖父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拒绝工作，在春天里，他经常穿一件旧呢长衫，拉着我在外面到处逛，用他的说法是“兜圈子”，漫无目标地在太阳下乱走，使我这个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认识了大自然孕育的各种可爱的生命。我学会了摘桑叶养蚕，钻草丛捉蟋蟀和下河里捞鱼虫。那时工人新村的绿化非常好，现在说起来有些不可想象，我住的那幢楼是三层青瓦楼房，前面是一片冬青树，后面是一片桃林。桃树从没结过果子，但桃花却年年春天开得灿灿烂烂，让人看了心里发颤。桃树不高，树枝很坚实。我念小学以后，外祖父给我灌了一脑子的悬梁刺股故事，使我习惯了黎明即起，温习课文。天不太冷的时候，一大早我爬到桃树上，仰面躺着，眼睛透过重重枝叶望着天色慢慢地变亮，嘴里大声地背诵课文。记得有一篇课文叫《寒号鸟》，讲一只鸟白天睡觉不肯垒窝，到晚上被活活冻死的故事，当我背诵到那只鸟在树上哀号“哆罗罗哆罗罗，寒风冷死我，明天就垒窝”时，突然想到自己趴在微微颤抖的树枝上，冷飕飕的晨风从身上拂过，就仿佛自己也变做了一只寒号鸟……

(陈思和)

串 联

我优哉游哉地度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最初岁月，直到学校停课，师生结伴以“大串联”为名四出游荡时，我才真正“投身运动”。

我觉悟过来，下决心出去闯荡世界时，中央已下令不得随意拦截汽车、火车等交通工具。也就是说，这回的长征，真得学老红军，依靠自己的两条腿了。可想而知，这样的“串联”，规模不可能大。

到底建立了什么战斗队，我忘了，反正拿到一张可以当路条和食宿证用的介绍信。走出校门不远，十几位本就不熟悉的同学，卷起红旗，作鸟兽散。胆子大的，直奔广州；我因为有两个弟弟同行，只好取其次，先到汕头再说。45公里路程，全靠脚板丈量，还是相当遥远的。跟着一杆红旗，走不

动，歇一阵，再跟上另一杆；反正潮汕公路上红旗飘飘，不会迷路的。就这样走走停停，到了下午四点多，还有三分之一的路程，只好出钱雇一辆自行车，把我们送到市里的红卫兵联络站。

白吃白住，除了到市委大院看大字报，就是游览几处本就不大、而今又经“破四旧”洗劫的名胜古迹。休息了五六天，正准备继续进发，接待站工作人员告知广州流行传染病，不免有点犹豫。那天上街，闻到烤白薯的香味，当即决定打道回府。日后读《世说新语》，得识晋人张翰见秋风起而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遂命驾归乡，感慨“深得我心”。

回家的路，似乎更遥远，好半路上遇见一运货的三轮车，允许我们轮流推车坐车，像闹着玩一样，居然平安归来了。

(陈平原)

70年代

女装

70年代的女性穿着蓝、灰、军绿色或者小碎花的上衣，穿着蓝、灰、军绿色或者黑色的裁剪肥大的裤子。夏天也有人穿裙子，只有学龄女孩穿花裙子，成年妇女的裙子则是蓝、灰、黑色的，裙子上小心翼翼地打了褶。最时髦的追求美的姑娘会穿白裙子，质地是白“的确良”的，因为布料的原因，有时隐约可见裙子里侧的内裤颜色。这种白裙引来老年妇女和男性侧目，在我们那条街上，穿白裙的姑娘往往被视为“不学好”的浪女。

女孩子过了18岁大多到乡下插队锻炼去了，街上来回走动的大多是已婚的中年妇女，她们拎着篮子去菜场排队买豆腐或青菜。

有些女孩插队下乡后与农村的小伙子结为伴侣，类似的婚事在当时常常登载在报纸上，被作为一种革命风气而提倡。那样的城市女孩子被人视为新时代女性的楷模，她们的照片几乎如出一辙：站在农村的稻田里，短发、戴